

湘潭大学中国史文库

# 秦汉隐逸问题研究

*Qinhan yinyi wenti yanjiu*

蒋 波◎著

湘潭大学 出版社



湘潭大学中国史文库

# 秦汉隐逸问题研究

*Qinhan yinyi wenti yanjiu*

蒋 波◎著

湘潭大学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汉隐逸问题研究 / 蒋波著. — 湘潭: 湘潭大学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81128-765-3

I. ①秦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隐士—文化研究—中国—秦汉时代 IV. ①K220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218773 号

责任编辑: 王正杰

封面设计: 廖 铁 李 平

出版发行: 湘潭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

电话(传真): 0731-58298966 0731-58298960

邮 编: 411105

网 址: <http://press.xtu.edu.cn/>

印 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71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8-765-3

定 价: 39.80 元

(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)

# 目录

## 绪言 / 001

---

## 第一章 先秦隐逸问题回顾 / 014

---

- 第一节 春秋之前的隐逸现象 / 014
  - 一、我国隐逸现象起源辨析 / 014
  - 二、商末周初的隐逸现象 / 017
  - 三、姜太公的隐居生涯及相关问题 / 020
- 第二节 东周隐逸现象及诸子的隐逸观 / 024
  - 一、春秋战国时期的隐逸现象 / 024
  - 二、儒家的隐逸观 / 026
  - 三、其他学派的隐逸观 / 029

## 第二章 秦汉隐逸现象概述 / 034

---

- 第一节 秦汉隐逸的原因分析 / 034
- 第二节 秦至两汉之际的隐逸现象 / 040
  - 一、秦代的隐逸 / 040
  - 二、西汉时期的隐逸 / 045
  - 三、两汉之际的隐逸 / 049
- 第三节 东汉的隐逸现象 / 055

- 一、东汉经学人士的隐逸 / 056
- 二、“无道则隐”与为“道”而隐 / 063
- 三、因孝而隐及其他隐逸现象 / 071
- 第四节 秦汉隐逸的特点及对秦汉隐士的评价 / 079
  - 一、秦汉隐逸的特点 / 079
  - 二、对秦汉隐士的评价 / 085

### 第三章 秦汉隐逸人物个案分析 / 090

---

- 第一节 商山四皓相关事迹考论 / 090
  - 一、商山四皓归隐的原因分析 / 091
  - 二、商山四皓在汉初宫廷斗争中的作用及评价 / 094
- 第二节 论东方朔的隐逸情结 / 099
  - 一、东方朔的隐逸言行 / 100
  - 二、东方朔隐逸情结的原因分析 / 102
- 第三节 严光对自由生活的主动选择 / 107
- 第四节 王符隐居前后的心态及其隐逸观 / 113
  - 一、王符隐居前的心态 / 114
  - 二、王符的隐逸观 / 117
- 第五节 诸葛亮的十年隐居与“待识”心态 / 120
  - 一、诸葛亮隐居十年的原因分析 / 120
  - 二、诸葛亮的“待识”心态 / 123
  - 三、隐居十年对诸葛亮的影响 / 126

### 第四章 秦汉隐士的生活 / 130

---

- 第一节 秦汉隐士的经济来源 / 130
  - 一、自食其力 / 131
  - 二、依靠他人“资助” / 135

- 三、隐居教授与卖卜为生 / 137
- 第二节 秦汉隐士的生活状况 / 140
  - 一、物质生活方面的情况 / 140
  - 二、家庭婚姻生活方面的情况 / 145
  - 三、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情况 / 146

## 第五章 秦汉王朝的“招隐士” / 151

---

-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“招隐士” / 151
- 第二节 秦王朝的“招隐士” / 156
  - 一、关于秦王朝“招隐士”的两种记载 / 156
  - 二、对上述两种记载的辨析 / 158
- 第三节 汉代的“招隐士” / 163
  - 一、汉代的“招隐士”活动 / 163
  - 二、汉代“招隐士”的特点 / 172
  - 三、汉代“招隐士”的效果及局限 / 177

## 第六章 隐士与秦汉社会 / 183

---

- 第一节 两汉社会的尊隐崇隐之风 / 183
  - 一、从尊隐到崇隐 / 184
  - 二、汉代尊隐崇隐风尚的原因及影响 / 192
- 第二节 隐士与秦汉学术文化的传承 / 196
  - 一、隐士与经学 / 196
  - 二、隐士与易学 / 198
  - 三、隐士与道学及其他诸学 / 202
  - 四、隐士与文化典籍的保护 / 205
- 第三节 两汉隐士与社会教化 / 207
  - 一、统治者在教化方面对隐士的充分利用 / 208

二、隐士与汉代乡风民俗的纯化 / 210

三、隐士“化民成俗”的原因及意义 / 214

## 结语 / 217

---

## 参考文献 / 222

---

## 附录 / 232

---

两汉之际隐士统计表 / 232

东汉隐士统计简表 / 241

略论司马迁的隐逸观 / 256

## 后记 / 265

---

# 绪言

## (一)

有机会或有条件出仕的士人长期或暂时性远离社会主流、主动规避政治活动的隐逸行为，在古代社会十分常见，梁漱溟先生甚至视其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：“中国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却有相当关系……我们今取它为第十四特征，而研究之。”<sup>①</sup>

而且，上述现象由来已久。至迟到商周之交，有信史可考的隐逸人物出现了，如为人熟知的伯夷、叔齐，另外吕尚、微子、箕子等人也有过或长或短的隐居生涯。<sup>②</sup>成书于商周之交或稍晚一点的《周易》经文部分，多次谈到归隐问题，可能正是这一时期隐逸现象的反映。<sup>③</sup>春秋战国时期，士人的归隐行为逐渐普遍化，诸子百家作品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对此均有讨论，表明“隐逸”开始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社

---

① 梁漱溟：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4页。

② 吕尚的隐居见《吕氏春秋·审应览·具备》：“太公尝隐于钓鱼矣。”《史记》卷七十九《范雎蔡泽列传》也记：“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，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。”“渔父”往往是古代有见识而隐于民间者的代称，可见至此吕尚仍具有隐居色彩。微子的隐逸见《尚书·商书·微子》，在乱世中微子曾向人询问：“吾家耄逊于荒？”后遂隐遁。箕子的隐逸事迹见《史记》卷三十八《宋微子世家》：“乃被发详（佯）狂而为奴。遂隐而鼓琴以自悲，故传之曰《箕子操》。”武王灭商，箕子献《洪范》，旋即远遁他乡。

③ 如《明夷》爻辞《六五》曰：“箕子之明夷，利贞。”“明夷”二字表示幽晦之意，引申为箕子隐藏民间。《蛊》爻辞《上九》亦曰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

会现象。

秦汉以降，见诸文献记载的隐士数量大大增加，而且隐逸类型更为多样，隐士的地域分布更广，对社会的影响更大，与社会的互动更频繁。与此同时，隐逸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——因孝道而隐、因道术而隐、学而优不仕或暂时不仕等。更重要的在于，先秦隐逸一般在政治动乱或改朝换代时出现，是政治清明与否、社会动荡与否的晴雨表，而秦汉一些太平盛世阶段仍有隐逸现象存在，并且形成一股风气。它说明隐逸不再只是困境中的退却，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旨趣。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。

本书即试图对秦汉时期的隐逸情况及相关问题做一探讨，主要包括秦汉隐逸发生的原因、各具体时段较为突出的隐逸现象、隐士与社会的互动（政府的隐士政策、隐士的社会影响）等。讨论以隐逸的行为主体即“隐士”为中心展开。

首先有必要对“隐士”作一简单概定。“隐士”之“士”，也即古代的“士”，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。前辈、时贤对此做了深入全面的论述，民国学者吴承仕指出，“士”最初的本意可能为古代男性劳动力（农夫）的通称，“《说文》曰：‘士，事也。’士古以称男子，事为耕作也……盖耕作始于立苗，所谓插物地中也。士事菑古音并同，男字从力田，依形得义，士则以声得义也”<sup>①</sup>。另有顾颉刚的“武士说”、徐中舒的“官长说”、余英时的“低级贵族说”等观点。<sup>②</sup> 这些看法多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“士”追根溯源。也有学者从“士”的职能内涵进行逆推，如许倬云、尤西林认为“士”的原型应为原始社会负责人神沟通

---

① 吴承仕的观点，见于杨树达先生的自述。杨先生说 he 关于“士”之原义的认识受教于吴承仕，详见杨树达：《积微居小学述林》卷三《释士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72 页。

② “武士说”、“官长说”、“低级贵族说”分别参见如下著作——顾颉刚：《史林杂识初编》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，第 85—91 页；徐中舒：《士王皇三字之探源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四本第四分册，1934 年版，第 441—446 页；余英时：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，第 6、9 页。

的“巫”、“覡”，及商周的“祝、宗、卜、史”，等等。<sup>①</sup>

以上关于士人早期涵义诸说，分歧颇多。不过，作为后世“知识人”意义上的“士”，大家有基本相似的观点，即认为它是从商、西周的“士”衍变而来，经过社会大变革的洗礼，以及贵族下降与庶人上升的交错流动，最终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崛起与独立出来。这一过程发生在春秋战国，至战国后期定型。我们所说的隐士之“士”，便是这个意义上的“士”。

当然，“士”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结构一成不变，而仍在变动着。春秋战国的“士”包罗万千，有以勇力著称的“武士”、“侠士”，以口舌为生的“辩士”、“游士”，以及“吏士”、“技艺之士”、“商贾之士”、“方术之士”，不下“百余种”。<sup>②</sup> 秦一统六国后，庞杂的士人群体迅速分化，诸如“商贾之士”、“技艺之士”等进入商业或技匠领域，不再称“士”。同时，在秦汉仕进制度定型与官僚职能分工日益明晰的背景下，士人的所指范围进一步缩小，最明显的是武士、文法吏开始成为帝国的专业官僚，与文士分开。文士逐渐转变为“士”的代名词。因此，本书讨论的隐士之“士”，比春秋战国“士”的范围要小得多，主要指有一定文化素养与见识的“文士”。

另一方面，又由于秦汉时期文士阶层并非一开始就定型完成，由士人生发出来的“士大夫政治”也处于一个渐进的过程，直到东汉末年才初步形成。<sup>③</sup> 所以，本书所说的“士”又不完全局限于“文士”（儒士）范围，还包括一些文献记载不多、不易确定其身份的人士与官吏。这也是论文标题使用“隐逸”一词，而不用“隐士”的缘故之一。

① 许倬云：《知识分子：历史与未来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—4页；尤西林：《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》第三章第一节《巫：知识分子的原型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01—111页。

② 刘泽华：《先秦士人与社会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页。

③ 古代“士大夫政治”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，参考了阎步克先生《士大夫政治演进史稿》一书中的论述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。

“隐士”之“隐”，在古代特定语境下也有特定涵义，它大致相当于“处”、“不仕”，与“出”、“仕”相对而言，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”《论语·泰伯》曰：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《孟子·万章下》也说：“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处而处，可以仕而仕。”那么，为何士人不仕就被称为“隐”？这是早在士阶层形成的春秋战国就被规范了的，士人自觉不自觉地将“出仕”作为自我理想实现的最好方式。儒家对“出仕”的强调尤为明显，视之为士人的义务，如《论语·子张》曰：“学而优则仕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也说：

周霄问曰：“古之君子仕乎？”孟子曰：“仕。《传》曰：‘孔子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，出疆必载质。’公明仪曰：‘古之人三月无君，则吊。’”“三月无君则吊，不以急乎？”曰：“士之失位也，犹诸侯之失国家也。”

自此之后，“士”与“仕”紧密联系在一起，“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”、“学以居位曰士”。有能力有机会出仕而因故不仕，便被称为“隐”。

关于“隐”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：第一，“隐”或“不仕”首先必须是个人的主观愿望、主动选择（不愿仕），并非所有不仕者都称之为隐士，否则秦汉的隐士何其多哉！所以，西汉初年因黄老思想盛行而不被重用的儒生，以及东汉后期被禁锢不能出仕的党人，都不在隐士的范畴之内（党锢之际主动归隐者、党锢解禁后不愿出仕者除外）。第二，关于“隐”的时间问题，是否必须隐居一生或大半辈子才能视为“隐”？我们认为，只要文献明确记载了某人有一段时间隐居不仕，即可成为“隐”，其本人这一段时间的身份也可认定为“隐士”。因为历史上终生不仕者少之又少，大多隐士都有或长或短的仕宦经历（例如被称

为“隐逸诗人之宗”的陶渊明也曾做过小吏)。秦汉时期的隐士大多如此，先隐后仕、先仕后隐、仕隐间反复者都很常见。

综上简而言之，本书所谓的“隐士”，是古代士人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，指那些具备一定文化素养、有机会或有条件出仕，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生或人生某个阶段选择不仕或暂时不仕，或者曾经出仕为官而因故主动去官不仕的人。判断的主要标准是文献记载，相关资料大多有一些“标志性”词语或短语，如“隐居”、“远遁”、“去官”、“不仕”、“不就”、“不应州郡之命”、“征而不至”、“不乐为吏”、“不喜仕宦”等。本书所要讨论的便是秦汉时期这一群体以及相关现象、问题。

## (二)

秦汉的隐逸现象及相关问题，汉代之后就被人关注。魏晋至明清时期，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：一是对秦汉隐士事迹的重述与补记。晋人皇甫谧的《高士传》记述了秦汉 50 余名隐士的生平事迹，有一些未见于前四史、汉代诸子著作。北宋类书《太平御览·逸民部》、《艺文类聚·人部·隐逸》也有大量搜辑；南宋祝穆的《古今事文类聚（前集）》卷三十二、卷三十三《退隐部》，同样辑佚了一些秦汉隐士的事迹、相关文学作品。<sup>①</sup>二是历代诗词作品对秦汉隐士的歌颂与评价，尤以商山四皓、严遵、梁鸿、严光等人为主。例如，唐代诗歌评价秦汉隐士的较多，有学者统计仅涉及商山四皓的就有 100 首之多<sup>②</sup>；宋代文人、隐士则对严光十分推崇，几乎将严光看作“隐士典范”<sup>③</sup>。三是针对一

① [宋] 祝穆：《古今事文类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511—546 页。

② 李文实：《历代商山四皓诗文集注》，（香港）新天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4 页。

③ 刘方：《严光的再塑造与宋代隐士典范的重构》，《湖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7 年第 4 期。

些具体人物及相关问题的讨论，主要见于正史隐逸传的序言部分、历代祠堂碑文的追述，如范仲淹《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》评价严光：“使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有大功于名教也。”<sup>①</sup>明、清札记对秦汉部分隐士的气节、开明国君的宽容政策等问题也有关注，譬如杨慎《升庵全集·焦光》认为：“（焦光）推荣忧不以累其心，损视听不以污其耳目，羲皇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<sup>②</sup>顾炎武《日知录·两汉风俗》指出光武嘉奖节义、隐士的行为改变了东汉士风，等等。诚然，由于学术风格、旨趣不同，古代的研究比较简短，多是局部、片断式的，缺乏系统性论述。

近代一些著作也涉及秦汉隐逸问题，最有名的为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蒋星煜的《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》，该书为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隐逸问题的专著。它对古代隐士的归隐原因、类型，隐士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，以及古代隐士的地域分布、隐士与古代绘画、诗歌的关系等都有阐释。因为是通论性著作，所以秦汉隐士多作为例子或例证散见于各章节。该书多次再版，最近经作者增补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重版。

近几十年来，关于秦汉隐逸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大增多。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，但部分章节涉及的不少，根据专著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：

一类在探讨秦汉士人时专列章节讨论隐士，刘泽华主编的《士人与社会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）》第五章《秦汉隐士》就是如此。本章分为三节，分别对秦汉隐士的生活环境、隐士的分类、价值取向、社会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分析。于迎春的《秦汉士史》第十二章《东汉中后期的不仕、隐逸之风及士人的人生安顿》，就东汉一朝的隐逸进行了详细叙述，并讨论了冯衍、张衡、蔡邕三人的隐逸倾向。

① 李勇先，王蓉贵校点：《范仲淹全集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90页。

② [明]杨慎：《升庵全集》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，第544页。

另一类是以隐逸为研究对象的通论或“通史”性质的著作，里面涉及秦汉部分。通论方面，有张立伟的《归去来兮——隐逸传统的文化透视》、吴小龙的《适性任情的审美人生——隐逸文化与休闲》等。《归去来兮》一书首先阐释以孔子、庄子为代表的儒道隐逸观，以及历代不同类型的隐逸，着重分析这些隐逸类型的特征、贡献与消极影响，以及历代统治者对隐士的态度与这种态度的本质。一如作者所言，该书将隐逸作为一种“文化—社会”现象，“重在论”，因此对每个朝代的隐士没有详细列举。有关秦汉部分，主要谈及东方朔、严光、申屠蟠、郑玄、仲长统等人。《适性任情的审美人生》第一章《先秦两汉的隐士群》，依据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中的大量隐逸典型，认为隐逸作为一种士人传统到东汉时期才“成型”。

“通史”方面，有何鸣的《遁世与逍遥——中国隐逸简史》，孙适民、陈代湘的《中国隐逸文化》，台湾学者王仁祥的《先秦两汉的隐逸》，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的《岩穴之士——中国早期隐逸传统》等。《遁世与逍遥》第二章第三节《秦汉：强权政治下的隐逸》，概括描述了汉代几位隐士，不过文字较短，只有数百字的篇幅。《中国隐逸文化》将古代隐士分为“全身适性之隐”、“撤退之隐”、“矫世之隐”、“蛰伏之隐”等类型，并对隐士的社会生活、文化活动，隐士形成的文化机制进行了分析（地理、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）。部分内容涉及秦汉隐士，同样多以例证的形式出现。《先秦两汉的隐逸》一书的第四章第三、四节，第五章集中讨论秦汉的隐逸，包括战国秦汉之际的隐士、东汉隐逸盛行的原因、东汉隐士的类型等。文青云的《岩穴之士》与《先秦两汉的隐逸》的时限大致相当，写法上也是夹叙夹议，专论部分相对较少。

此外，还有谈论隐士与文学、美学关系的著作，以及部分较为通俗的读物，也涉及秦汉隐逸情况。

专著之外，亦有不少研究论文。大陆学界相关论文很多，如：

王子今《论申屠蟠“绝迹于梁碭之间”——兼说汉代“处士”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》一文，以“高士”申屠蟠避征归隐为个案，指出在汉末特殊的政治环境下，部分士人选择“明哲保身”的隐逸生存方式，以及后人对这种选择的不同评价。孟祥才《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》一文按隐士的素质、动机将东汉隐士分为儒隐与“道隐”、真隐与假隐几种类型，并分析了儒隐与“道隐”（纯隐士）归隐的原因、特点。黄宛峰《论东汉的隐士》一文认为，隐士对古代士阶层的影响十分深刻，古代士人的人格与尊严“主要体现于隐士的言行”，中国古代隐逸现象的盛行“始于东汉”；东汉隐逸现象的增多，与“儒学的普及”、“士大夫阶层的形成”，以及儒生跟专制政体之间的矛盾等因素有关。王继训的《试论两汉隐逸之风》论述了王莽时期、东汉一代的隐士，并将东汉隐士分为“先隐后仕”、“先仕后隐”与“终身不仕”三种类型，最后分析东汉隐逸之风盛行的原因。章义和的《论汉魏六朝的隐逸之风》将东汉、魏晋南北朝的隐逸放在一起讨论，认为汉魏隐逸盛行，跟当时社会的选举制度有关，更在于“士大夫群体的自觉和个体自觉”；同时认为当时的隐逸风气对古代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，其中对古代哲学、士人人格的觉醒、古代文学的发展作用最为突出。刘厚琴的《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》探讨儒学、儒家思想对东汉士人归隐选择的影响，同时认为士人归隐对儒学发展有一定作用。张骏翬的《试论两汉隐逸文化中的道统问题》，讨论坚持士人人格独立（道统的重要表现）对两汉士人仕、隐的影响。齐涛的《论东汉隐士》分析东汉隐士增多的原因，将东汉隐士分为“以隐求名干禄”、“邦无道而隐”、“不求闻达”等类型。宋文娟的《西汉士人隐逸观》认为西汉早、中期是一个弥漫着事功情怀的时代，士人积极进取，隐逸现象相当微弱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西汉末年，王莽篡权，士人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一体感，用隐逸来表达激愤与抗争，隐逸现象增多。

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，如：朱锦雄的《东汉末年“黄宪现象”所展现的隐逸型态与理想人格》，以东汉后期隐士黄宪为个案，指出黄宪属于“随周遭发生之事而动”的隐士类型。黄宪之所以在当时备受推崇，是因为他清洁不仕的行为符合人们理想人格的模型。许尤娜的《隐者、逸民、隐逸概念内涵之厘清——以东汉之前为限》重在讨论隐逸的概念，文章认为东汉之前隐士有三个原型：隐者、逸民与隐逸。隐逸是隐者、逸民两词的“复合”。东汉之后的隐逸情况与之前有所区别，不少人归隐与外界政治等因素无关，完全是一种性情所好，这对于魏晋隐逸之风有影响。刘为博的《略论〈史记〉中的隐士》，该文先讨论隐士的定义，将《史记》中记载的隐士分为“有详细事迹的隐士”、被称“隐”之士两大类（包括秦汉之际的商山四皓）。同时指出《史记》开了“隐士入史的先声”，对班固、范曄等史家有重要影响。郜积意的《汉代隐逸与经学》回顾了庄子、孔子、韩非等人隐逸观的不同，将汉代隐士分为先仕后隐、先隐后仕、终身不仕三种类型。“终身不仕”的隐士又可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种是声望很高的，一种是无名者。经学经义中预设了对声望很高者的认可，试图以此来教化社会、弘扬德行。

除了专业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，还有一些相关学位论文，此处不赘引。

当然，上述列举的（尤其是期刊论文方面）只是其中一部分，而并非全部。由此可见，对于秦汉隐逸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。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：第一，从时段上看基本集中在东汉，而对西汉尤其是秦朝的隐逸情况讨论较少。第二，从内容上看，多分析秦汉隐士的类型、归隐原因；相关论著、学位论文涉及秦汉隐逸的较多，专门讨论的不多（学位论文一般为文学专业同人的成果，讨论角度与历史学的讨论有所区别）。第三，多为概述、概论，个案研究相对较少，对秦汉隐逸中的突出现象关注不多。即宏观研究较多，微观研究不足。第

四，一些论著就隐逸谈隐逸，而对相关问题如隐士对社会的影响、政府对隐士的征召等讨论不够。指出这些，并非吹毛求疵，而意在说明关于秦汉隐逸这一论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与必要。本书的主要目的，正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工作，尝试对秦汉隐逸进行专题性、系统性、深入性研究。

### (三)

如前所述，学界对秦汉时期的隐逸问题有过不少讨论，但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、系统研究的不多；有一些以秦汉士人为研究对象的专著，但还不见专门讨论隐士的。而且就“仕”、“隐”比较而言，目前学界对秦汉时期“仕”的情况（制度文化、“官”文化）研究比较充分<sup>①</sup>，而对于“隐”的研究相对薄弱。因此将隐逸行为及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，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秦汉的隐士群体，以及整个士人群体在秦汉这一“士大夫政治”形成阶段的具体情况，并以此反观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、思想潮流、学术发展等。这是本书的一个目的。

其二，儒、道思想是古代两大思想源流与支柱，古代士人浸淫颇深，他们往往同时具有儒、道双重性格特质。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，它主张积极入世、积极干政，具有浓厚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，因此古今儒生多以天下为己任。然而在封建社会一开始读书人就碰到了兼济与独善、专制与自由、服从与独立的矛盾与两难选择。在抉择面前，部分士人最终选择不仕或暂时不仕，走向了清静自守的道路。秦汉时期尤其在王朝交替的两汉

---

<sup>①</sup> 有关秦汉“官”文化方面的研究，成果很多，如安作璋、熊铁基的官制研究、黄留珠的仕进制度研究、阎步克的察举制度研究、卜宪群官僚制度研究、余华青的廉政制度研究，以及与之相关监察制度、考课制度、刑罚制度、某一具体官职的研究等等，不一而足。